

艾蒂安·卡贝和
伊加利亚共产主义

商 务 印 书 馆



D091.6
31

82387

艾蒂安·卡贝 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

〔德〕海因利希·卢克斯 著

钱文干 钱霖生 译

柳凤鸣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 年·北京

Г. Лукас
ЭТЕННЪ КАБЭ
И

ИКАРІЙСКІЙ КОММУНИЗМЪ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кое Т-в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896

根据圣彼得堡教育出版社 1896 年版译出

ÀIDĪĀN KǎBÈI HÉ YǐJIALÌYÀ GÒNGCHǎNZHŪYǐ

艾蒂安·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

〔德〕海因利希·卢克斯 著

钱文干 钱霖生 译

柳风鸣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14-4/D·74

1992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17 千

印数 0—1000 册

印张 9 1/4

定价：3.90 元

译者的话

——关于《艾蒂安·卡贝》

《艾蒂安·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一书，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部有价值的书，实际上也是卡贝的一部传记。

大家知道，艾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 1788—1856 年）是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使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成为一个体系，并力求付诸实践——创立实验其共产主义的伊加利亚移民区。马克思指出：“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在法国一共将近 50 万人，妇女和儿童还不在此内。这不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大军吗？”法国在 18 世纪中叶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强大的伊加利亚运动呢？这个运动又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称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些都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们所关心的、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本书将是解答上述诸问题的钥匙。有关卡贝和有关伊加利亚移民区兴衰史的著作，在中国可以说是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介绍上一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海因利希·卢克斯博士撰写的《艾蒂安·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一书。本书是根据俄国圣彼得堡教育出版社 1896 年俄译本译出的。

卡贝是法国众多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当中、唯一把自己的理想大胆地拿到北美大陆去进行实验的代表人物。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伊加利亚移民区最终“在美国吵吵闹闹和陷于半破产”（恩格斯语），而“伊加利亚之父”卡贝则最终也被

开除出移民区……这些奇特的历史现象，都是值得人们加以研究的。本书如能对读者思考以上诸问题有所裨益的话，我们将会感到十分高兴。

为深入了解卡贝，中文本译者辑录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卡贝的评论作为本书附录附在书后以飨读者。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钱文干 钱霖生

1986年7月11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卡贝是政治家	7
第二章 卡贝是共产主义者	17
第三章 《伊加利亚旅行记》	44
第四章 伊加利亚运动	90
第五章 伊加利亚的建设	134
移民区的开拓	134
参观伊加利亚移民区	141
争执与分歧	154
第六章 伊加利亚的结局	166
圣路易斯和切尔滕纳姆	166
多数派	172
新伊加利亚	182
青年伊加利亚	185
斯佩兰察伊加利亚	189
第七章 结束语	193
附录一 共产主义信条	200
附录二 大革命前夕的法国	215
附录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卡贝的评价	282

前 言

现在资产阶级世界比以往更关心通过一些天才头脑设想出来的社会制度，来消灭地球上人类所受的灾难和贫困，这种现象也绝不是偶然的。当今已经到了这种时候，甚至连那些最讲究安逸生活的凡夫俗子也开始从昏睡中惊醒过来，他们本能地感觉到：我们已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发生大转变的前夕。他们意识到所有建立最美好的国家的种种幻想，实际上也仅仅是幻想而已，一切想取代神圣的财产和神圣的家庭以建立共妻或不共妻的“最令人讨厌的共产主义”的企图，都已遭到失败。这种意识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宽慰。这些头脑闭塞的人把历史事件看作是不能分离的比翼鸟：只要一只死，另一只也必死无疑。不久前出现了一部匿名作者^①的著作，此人扬言要消灭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消灭他所谓的“倍倍尔的乌托邦”（1），其实，被他的批判刺伤的正是社会主义的亲朋好友——空想主义。

当然，要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进行批判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是受我们早已经历的时间和各种关系所制约的。但是，很难令人理解的是，为什么在那些天才的观念、逻辑严密的叙述中，关于最佳国家结构的一切体系设想，总是停留在一些虚幻的空想主义的阶段上。更难使人理解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未来的新国家，而在于对社

^① 弗·威·格鲁诺夫：《安乐国的政治》，莱比锡 1892 年版。这本书的批判部分在很多方面还真不如对那些最著名的乌托邦学说的客观的叙述；作为一部社会小说史纲要，这本书可能是颇有裨益的。

会及其内在的动力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但是，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想要消灭社会主义，首先要攻击未来国家。因为它不能习惯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而社会主义又不打算发明一种完全崭新的理想的国家让它得到满足，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把这项任务担当起来（尽管这项任务与唯物史观有着尖锐的矛盾），然后，它又毫不费力地象孩子游戏那样亲手把这条纸糊飞龙毁掉。

不无趣味的是：象欧根·李希特尔的《未来世界》和格列戈罗维乌斯的《人间天堂》这两个剧本^①（此书虽然具有讽刺性，但它们确实确实是纯粹的乌托邦），为它们提供各种素材的恰恰是我们的中等资产阶级。这些阶层的人正好处在资本主义两股势力（一股为大资本家的垄断势力，另一股为无产阶级）迅速分化的情况下，夹在中间而特别地感到不愉快。他们惊恐万状地看到：他们的同行一个接一个地从塔碧亚悬崖^②被抛掷下去而粉身碎骨，因为他们来说，单是丧失财产一事，就已经是大难临头了。此外，对无产阶级这一阶层的人来说，财产对私有者的关系更具有纯个人的隐秘的性质，他们既不同于大资本家，也不同于无产阶级。因为无产者对财产只有一种近乎幻觉的想像，一般来说，他们除了有一双劳动的双手外，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是归自己所有的。他们无一分田，无一间房，无一分地，无一台机器，也无任何生产资料。他们有点可怜的家具，有件可怜的衣服，也常常是从当铺里刚赎回来的，而即使这两者，也都是些需要修修补补的东西。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正好相反，他们的财产今天可以变为大量的铁路股票，明天又可化为抵押借款，或者转为矿业资本或制糖业资本等等。财产转让的灵活性和财产占有形式的不断变更，消灭了一切对财

① 弗·威·格鲁诺夫，莱比锡 1891 年版。

② 塔碧亚悬崖，相传古罗马时犯叛国罪者，都被处以从这一悬崖抛掷下去的死刑。——译者

产的私人所属关系。只有中产阶级死死地抓住土地不放，他们象自己的祖先时代一样，满脑子偏见，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他们的私有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他们的房产和农业经济已背上沉重的债务，他们本人也变为资本的奴隶；如果他们经营的企业要他们付出巨大的劳动，他们的收益也是少得可怜，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工人也不会为这样的收益去动一动自己的手指的。但即使如此，这些中产者还坚信，只要侵犯他们最神圣的财产，就等于夺去他们生命的一个部分。至于涉及对婚姻和家庭的蓄意侵犯问题时，他们同样归咎于社会民主派，这些可敬的小市民越是在妓院的僻静的斗室里容忍这样的侵犯，他们越会在大街上大声疾呼地反对这种侵犯。当然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沙漠里的沙子，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堆里，要知道推沙的独轮车是足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书刊和我们的思想自由派的和民族自由派的报纸都作了充分的证明。

如果，从一方面看，对这个社会阶层的人来说，乌托邦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末，从另一方面看，也证明有相当多的无产者还是沉湎于乌托邦的幻想中。这些人渴望风暴和激进，他们总觉得一切都进行得太缓慢了，虽然在事实上，社会发展的暴风雨般的步伐进展得已够神速的了；他们想从现实生活的贫困状态一步跨进“未来国家”的天堂里去。在这些人的头脑中，总存在着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他们相信，无产阶级只要能把国家这条大船的舵抓在自己的手里，再加上烧好蒸汽锅炉，那末，他们一定能很快地到达未来的天堂花园。

对于这样一些“狂飙突击运动”的乌托邦主义者（诚然他们并不是特别成熟的，但他们毕竟属于最能大声疾呼的人），有一个事实是最能使人清醒的，那就是：尽管这些风暴的拥护者想方设法去加速社会发展的进程，但他们在国家这条大船的船舷上却碰得头

破血流，而那火力过足的锅炉在汹涌奔腾的波浪冲击下所引起的致命后果，就是折断大船的螺旋桨——这样一来，加快航速就无法实现了。

但是，对社会主义来说，乌托邦主义者及乌托邦的体系远远并非只具有历史的意义；因为在乌托邦思潮里已经孕育着对社会制度进行批判的萌芽，这种社会制度决定了特殊的符合时代特点的乌托邦模式。在乌托邦学说中，有大量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东西可以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乌托邦思潮除了能反映时代的精神外，它们也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文献，这种文献要比眼光短浅的历史学家所写的东西要珍贵得多，而且应当指出：乌托邦思想的功劳还不仅仅局限于此。“乌托邦主义者之所以成为乌托邦主义者，原因在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他们无法作别的选择。他们被迫只能在自己的头脑里对新社会结构的各种细节作出自己的设想，因为在旧体制的社会里，这些细节还不能明显地表露出来。为了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只能局限于靠理性来思索，因为他们不可能要求历史提供无法提供的东西。”^①

我们应该根据这个观点去评价艾蒂安·卡贝的一生。圣西门^②是位伟大的天才，傅立叶^③不仅善于想象，而且观察深刻、富于创新精神，而托马斯·莫尔^④既显得崇高超人，又显得朴素伟大——和这些伟人相比，卡贝当然是远不如他们，并且在他所处的

① 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霍廷根—苏黎世，1886年第二版第251页。

② 圣西门（1760—1825年），法国卓越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③ 傅立叶（1772—1837年），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不主张用革命方法实现共产主义，他主张对人进行教育，并依靠慈善家的资金；他设想新社会的基本细胞为《法郎吉》——一种空想的社会制度。——译者

④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英国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空想共产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乌托邦》一书。——译者

时代里，他与这些伟人的天才相比，只不过是一位平庸的实干家。但是卡贝在无产阶级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作为思想家的卡贝这个人物的本身，也许正因为他善于平凡地实干，他对当代法国无产阶级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天才人物圣西门或傅立叶，因为这两位人物的学说对广大的群众来说还是很生疏的。

这个事实是很难用旧的对历史作传奇性的描述来解释的。旧的观点总把历史看成是个别人物活动的产物。事实上，每一个时代的领导人物经常是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的体现者；他们之所以具有历史性意义，并非因为他们能够去发掘天才的思想，而是因为这些思想已经具备一切必要条件并受到大家公认的时候，他们能够去实践这种思想。他们的活动富于创造性，首先表现在他们善于从具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观点、认识的各色人群中看到一种共同的原则，并且善于创造出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每个人，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能找出观点相同的老相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迅速地对自己的领袖产生满腔的同情之心。在这里也能看出民主社会舆论达到何等的觉悟程度。单个人的思想、认识越是低，那么，某种煽动性的演讲越能强烈地抓住群众的心灵并吸引他们，因为这种演讲以令人炫目的光辉在群众中造成一种思想的迷雾；如果说油脂制的蜡烛发出黄色的光芒比起电灯的光束更能透过浓雾，那么下列事实就不足为奇了：譬如，反犹太主义（有人相当尖刻地称它为蠢人的社会主义）就能在这个以思想特别呆滞死板而著称的中产阶级社会中赢得这样巨大的同情。

这样，人们可能感到历史是由个别人物创造的，而事实上，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完成这个使命，至于那些天赋极高的人物，只不过是人民群众的意志的表达者和执行者，关于这一点，他们自己甚至往往都没有意识到。容克俾斯麦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

这里，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个别人物的思想力量

可以左右世界局势，而且思想可以不顾物质条件，决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道德面貌，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经济潜力制约着人们世界观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最终是由某个学识渊博的聪明人物加以概括总结出来的；所以，在历史上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好象个别人物的思想推动了时代前进。

由此可见，我们要评价一个人物对其所处的时代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具有的性质上，这个社会环境首先只能是当时的经济条件造成的结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应当把每一个杰出人物的个人特色看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镜子，在这面镜子的聚光点上纵横交错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生活的无数光束。

卡贝的一生就是这样一面镜子，它反映了法国人民在由法国大革命为它所开辟的发展道路上经历过的社会生活和所走过的路程。

如果说卡贝并没有跻身于我们时代最著名的杰出人物的行列的话，那么，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中，论无私和忠诚的品格方面，他应当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卡贝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基础是他对劳动和受苦受难的人类纯正的爱；他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作的斗争中所付出的精力，使他自己成为具有特殊吸引力的人物。

第一章 卡贝是政治家^①

艾蒂安·卡贝于1788年1月1日生于第戎市(科多尔省),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从法国革命的意义上看)的箍桶匠的儿子。这就是说,他出身于那时刚开始准备进行伟大的解放斗争的第三等级。他从父亲那里受到启蒙教育,他父亲很早就开始让儿子熟悉他经营的工场的活计。父亲早就想培养他当教员,他刚满十二岁,父亲就让他听著名教育家和革命者雅卡托的课。这种被称之为“普及教育”的雅卡托教学方法是出色的,后来这种方法以稍加改变的形式为图森-兰根沙特体系所采用。这种教学法就是:雅卡托强制学生用外语去背诵所学的第一本称为特列马克(Telemaque)的书;通过这种方式,学生马上就学会正确地读、写和说,而不必让自己的脑子堆满无用的语法公式。卡贝非常感谢雅卡托给他的广博知识。由于雅卡托的影响,卡贝对生活的看法充满着革命的精神,这种精神后来使卡贝成为资产阶级眼里的危险分子。经过几年的预备学习,卡贝转而悉心研究医学,但他不久便认识到,维克多·蒲鲁东为他揭示的奥秘的法学科学,会使他得到更多的东西。1812年,卡贝取得了法国博士学位,并且马上在一种立志舍己献身于人民的特殊感情支配下,从事律师工作,其目的,正如他谈到自己时说的^②,是要献出全部身心来保护穷人、弱者和被压迫者。

卡贝的生活方式是简朴适度,他把所有的时间和全部身心都

① 我们在这里利用的是大众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卡贝先生当过总检察官、众议员,大众的经理,对共产主义的敌人进行过答辩。巴黎大众出版社(1847年)。

② 卡贝为被指控犯欺骗罪的公民作辩护。

投入到劳动中；自私自利和贪图享乐对他的性格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有人对他自己所表白的话有怀疑的话，那末，他后来的生活就能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在“百日”^①期间，他是勃艮第“捍卫祖国独立，抵御外国侵略”爱国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这个联盟，也象在其他省内建立起来的联盟一样，是一直受到拿破仑长期压制的那种共和思想早期的星星之火。由于极易解释清楚的概念上的混淆（例如出于厌恶复辟），人们把共和制和拿破仑混为一谈。这些社团，后来在复辟时期，成了波拿巴丑剧的主要台柱，为侄儿登上伯父的帝位帮了不少的忙，还使法国从它曾经在大革命时期经历过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向后倒退。

拿破仑由于完全不理解爱国独立联盟的有关共和思想的原理，以及过高估计联盟给他的援助，所以提议时年25岁的卡贝担任王室检察官的职务，但卡贝拒绝了。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得了当波旁王朝复辟之后，他们把卡贝当作波拿巴分子加以迫害；此外，还禁止他、蒲鲁东和雅卡托三人在三个月内从事职业活动。尽管有这个禁令，卡贝依然为一个名誉遭到极大损害的爱国者进行辩护。在诉讼过程中，由贵族代表组成的法庭，通过自己的代表向王室呈文，提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拉拢卡贝倒向王室复辟分子一边。这对卡贝来说，已是第二次机会了，一个人，只要谦恭不如卡贝，他就会受虚荣心的驱使，使自己能在享受至高荣誉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在这个案件之后，卡贝为被指控参与波拿巴阴谋案件的沃将军辩护，并挽救了他，还挽救了其他12位被指控者；此外，他还防止了政府执行每省除掉7个人的著名的计划，从而，他对法国和

^① “百日”，指拿破仑第一从厄尔巴岛逃回后，第二次统治法国时期（1815年3月14日—6月22日）的称谓。他在比利时滑铁卢失败后，被迫再度退位，遂被流放到大西洋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死在那里。——译者

科多尔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政府当然不会不在这个人物的身上看到一个极不利于实现他们反革命意图的棘手的障碍，这个人物能言善辩，会破坏他们一切最如意的算盘。因此，政府欣喜若狂地抓住一个机会，重新剥夺卡贝从事律师活动一年的权利。求之不得的口实就是卡贝在处理一件有关谋杀的案件时曾无情地揭露官吏们对无罪受控者设置阴险圈套，这样，他自己就犯下了一条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法国，而且不仅在法国，甚至被认为比谋杀罪本身更为危险的罪行，如果这种谋杀是为当局所默许的话。

这种停业休息对卡贝来说，甚至是极为有益的：由于过度疲劳，他染上了能导致双目完全失明的眼疾。只是靠彻底戒烟戒酒，他才得以保住了视力。

社会生活的旋风把卡贝从外省卷送到法国的大脑和心脏——巴黎。在这里，他和最勇敢的议会代表曼努埃尔交往甚密，并参加了烧炭党人的共和联盟。他还迅速地取得了这样显著的地位：在一次规模巨大的会议上他被选为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和他一起当选的有拉斐德、达尔让松、克希林、科尔谢、曼努埃尔、杜邦·德·累尔及五名其他成员。受这个领导机构的委托，他三次进出茹瓦尼、第戎和里昂各地作宣传工作；由于封建反动势力残酷压制各种民主思潮，他的生命曾多次受到威胁。

以上我们看到，烧炭党人运动对推动七月王朝的诞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卡贝在政治远见方面未必会超越他的同伙——烧炭党人。他看不清国王——资产者在革命外衣下的反革命马脚，因为后者巧妙地进行了伪装。因此，他在亲身参加七月革命后，在当过卢森堡和奥登的临时市政府委员后，毫不考虑分寸，便径直公开上书给众议院，并于8月3日写信给他本人并不熟悉的路易-菲力浦。他在信中抗议、反对1814年的宪章，要求制宪议会或国民公会重新制订新宪法。

写公开信是卡贝的拿手好戏。他本人在一切活动中从不玩弄手腕；他总是一片诚意地相信只要言辞恳切、合乎逻辑、证据朴直，就能说服每一个人。因此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有权者当局写公开信，他怀着孩童般的天真，虔诚地恳请他们为了人道和正义来考虑人民的利益，并保证他们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卡贝不是那种想依赖刀光剑影或武装的人民群众来迫使当局承认人民的权利的险恶的阴谋家；他倒是一个幻想家、空想家，因为他指望通过绝对真理以驾驭各社会力量的斗争。作为一个幻想家，他在判断人的时候当然就显得惊人的近视。例如，他对路易-菲力浦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欲望，却抱着无限幸福的乐观希望；这位路易-菲力浦曾经通过拉菲特在宫廷召见过卡贝，当时路易-菲力浦只不过企图通过卡贝来取悦于群众，然而卡贝却喋喋不休地陈述各种民主要求，这使国王厌烦透了。同样，卡贝也看不清这位在科多尔省代表面前与他握手的国王的拙劣恭维所包藏的蛊惑人心的意图，卡贝竟陶醉于这样的想法：他的真切坦率的言辞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给这个国王呈送一份接一份的备忘录。

国王正在寻找一个妥当的理由以打发这个爱吵吵嚷嚷的为民请愿的人远离巴黎。过去，他为了笼络人心，抬出一个烧炭党人杜邦·德·累尔当部长；而现在，他以同样的目的，指派卡贝为科西嘉的总检察官。在那里，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居民们对执政当局永远心怀敌意，这样一来，卡贝将不得不把精力从政治方面转移到对资产阶级王朝危险较少的另外一个领域中去。卡贝轻信地进入了为他巧妙地设置好的圈套里去。但是，如果政府真的以为卡贝处在科西嘉的骗子和强盗当中更能了解七月革命的精神，并真的体会到给他的极为明显的暗示——“发财去吧！”，那么，政府是大错而特错了。代替他个人发财的事实是：卡贝肃清了科西嘉岛上的强盗，使居民习惯于廉政，实行了陪审裁判。这一招使国王大为不满，

因为这种陪审裁判不止一次地使国王不能为所欲为。小资产阶级总是满怀天真的幻想，他们始终不信革命已经过去，人民从火中取来的栗子已被大资产阶级瓜分；卡贝还继续在火中寻找栗子，而且在自己的所有言谈中要求完成革命事业；召开制宪会议，颁布新的宪法，支援意大利、比利时和波兰的解放运动。

政府早就对卡贝的言行极为不满，当他被科多尔省的爱国人士推选为众议院代表候选人而阐述了自己的激进民主主义政纲时，政府就利用这个合适的时机，通过巴尔特让卡贝完全引退。巴尔特这个人比起老实的杜邦·德·累尔来更为机敏灵活，他摇身一变，马上抖落掉烧炭党人的一段历史，成为现任部长。我们只要回顾一下科西嘉的居民和官吏是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来纪念卡贝的，我们就不难理解卡贝对人民群众具有多么巨大的影响。见解独到、刚直不阿、襟怀坦白、廉洁奉公的官吏对人民来说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这种品格是人民永远所敬仰的，特别是在这个腐败透顶的社会中，他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人民本能地感受到，在这个谦逊无私的人身上，他们发现一位能体现他们利益的唯一忠诚的代表，他们闭着眼睛尽可以放心地跟随他走。

王室和内阁千方百计地不让卡贝当选为科多尔省的代表。卡贝当时的处境确是异常的艰难，因为他的竞选对手是科多尔省的原代表、自由党泰斗之一的肖夫兰侯爵。但是，他不顾一切阴谋诡计，终于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当选为众议院代表，并于1831年7月31日进入众议院，他处于摩干和拉马克将军之间，属于最左翼阵线。不久，卡贝被公认为民主派中最先进的人物。1831年10月他在告选民书中公开揭露了政府的叛变，并建议反对派（当时已有200多成员，包括拉菲特在内）制定建立民主党派的纲领；在150名众议院代表的配合下，编撰了一份“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反对派谴责现政府出卖七月革命，使法国沦于专制独裁的手中。作为反对派的领